



从“暮年似的孤寂”说起： 论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体验

丁世鑫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鲁迅的“中间物”理念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渡的存在物”理念,都是基于人是一种不完满的存在的人性观,当二者同时立足于这样的思维基点来思考个体生命时,他们自然就会远离乐观的理性主义所产生的群体性倾向,走向个体性的生命体验,沉浸于“暮年似的孤寂”,同时在作品中展开了对于虚无、孤独、绝望、死亡等命题的洞察与思考。

关键词: 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0) 02-0036-06

"Loneliness of old age": Lu Xun and Dostoevsky's life experience

DING ShiXin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Lu Xun's "intermediary" concept is similar to Dostoevsky's "transitional existence" concept, and they are both based on the human nature view of an imperfect existence. When both of them think about individual life based on such thinking simultaneously, they will naturally be far away from the group tendency produced by optimistic rationalism, go to the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and immerse in the "loneliness of old age". At the same time, they launch their insight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opositions of nihilism, loneliness, despair and death in the works.

Key words: Lu Xun; Dostoevsky; life experience

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极为欣赏的,他不仅写过两篇关于陀氏的专文(专文介绍一位作家,这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仅此一例),而且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中都极力推崇陀氏,对于其作品的译介工作也给予大力的支持。对于鲁迅这样至情至性的人来说,这种欣赏显然是发自肺腑的,是出自于思想和心灵层面的共鸣。在个人经历和性情上,二人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并且这种经历和性情都直接地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因此当鲁迅读了陀氏的《穷人》时,就“吃惊于他那种暮年似的孤

寂”^{[1]162}。《穷人》在20世纪的中国极受欢迎,也是陀氏的第一部中文译著,但是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是在“为人生”的层面上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而鲁迅的评价却是一种带有极强的个体主观体验的诉说,可以说也是一种自喻式的感慨,究其根源,它来自于鲁迅的“中间物”理念所导致的对人生的幽暗意识。

一、对圆满的质疑

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谈到自己此时在南普陀寺山中的心境,说到“电灯自然是辉煌着,

收稿日期:2019-01-07 网络出版日期:2019-1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JA751007);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19JC094);浙江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9Q111)

作者简介:丁世鑫(1975—),男,山东济南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研究。

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袭击我的心”^{[2]275}，“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2]275}，于是在下文中提到了“中间物”的概念，他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2]279}，而那些“不三不四的作者……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2]279}，但是“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2]279}，显然这里的“不三不四的作者”是鲁迅的一种自嘲。一切都是中间物，甚至包括“警觉”到这种本相的自己，任何的“完美”和“不朽”都是不存在的，人生不过就是“过客”。这种意识和感受显然不同于崇尚理性至上的启蒙思想，而是立足于一种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话语和视角。因此鲁迅对于启蒙主义者所设计的那个“止于至善”的理想王国是极为反感的，宁肯“彷徨于无地”^{[3]6}，也不愿去“将来的黄金世界”^{[3]6}；宁肯走向坟墓，也断然拒绝任何有关永恒的假说。他明确地指出，“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4]118}，但却是将人“钉死”的“棺材钉”^{[4]118}，进而确认了不圆满和有缺陷才是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正常存在状态。由此，鲁迅反对一切关于绝对性和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似的引导，自始至终都在做它们的否定性力量和对立面，喊出“怪难的真的恶声”^{[5]45}，“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们以“小不舒服”^{[2]2}，“和黑暗捣乱”^{[6]68}，做恶魔式的“轨道破坏者”^{[2]186}。这就造成了他的内在孤寂感和与所处世界的决绝冲突，他的声音就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他人耳中“报告着大不吉利事”的“枭鸣”^{[1]2}。

当鲁迅带着这样一种精神姿态遇到陀氏时，即刻就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心灵共鸣，因为这种对“圆满”的质疑与同样存在于陀氏的意识与个体体验中，他于此中也听到了犀利的“枭鸣”。在《穷人》中，鲁迅品读出了陀氏对人性的“拷问”，这种“拷问”即是来自于对人性不完满的清醒认识，正因为这种人性观中的人是不完满的、有恶性的存在，所以那种乌托邦似的对现实世界的规划便是沙上之塔，不过是小清新似的呓语。陀氏对人曾下过这么一个定义：

“尘世间的、只能是不断发展着的存在物……因此，他不是已完成的而是过渡的存在物。”^{[7]321}

不难看出，这种“过渡的存在物”的说法非常类似于鲁迅的“中间物”概念。在陀氏看来，启蒙主义对历史及人类设计的所谓完美的极乐世界，永远只

是一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洞词汇。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氏称这样的极乐世界为“永远破坏不了的水晶宫”^{[8]69}。在《鳄鱼》中，他尽情讽刺了那种认为“只靠伟大的思想就能填饱肚皮，这些思想的光辉照亮了我周围的黑夜”^{[9]576}的人类前途的设计师。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专事否定”的魔鬼形象，用了两万余字的篇幅告诉世人：在和那散（黄金世界）实现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一切的完结”^{[10]981}。在陀氏看来，“魔鬼”体现的是否定、毁坏和人性的亏缺，这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形态，也是它的推动力量。他借魔鬼之口指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给我加上了一种我不能理解的使命——让我专门去‘否定’”^{[10]971}。出于这样的前提，任何关于人间天堂的理性设想都是一种虚妄之说，“固然神圣，却未免有一点无聊”^{[10]972}，这样的声音在理性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极为疯狂的。对于这一点陀氏毫不掩饰，他在十几岁时就说过自己要做一个向世界捣乱的“疯子”，“让人们去狂怒，让他们来医治”^{[11]4}，在晚年还自称“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方面，一辈子都是越界的”^{[11]174}，甚至说“我十分清楚，我更大的本事倒不如说是散布失望和厌恶”^{[12]353}。这样幽暗的气质和文学表达便使他被贴上了“残酷的天才”的标签，同时就有了“恶魔派作家”的评价，用高尔基的话来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但他是我们的恶毒的天才”^{[13]178}。然而，鲁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5]86}，这既是对陀氏的评价，也是触动心扉之后的自语。

当鲁迅与陀氏都自觉地远离乐观的理性主义这样一种群体性倾向，同时用“中间物”这种思维基点来思考个体生命时，他们自然就会沉浸于那种“暮年似的孤寂”中，同时也形成了他们思想与作品中对于虚无、孤独、绝望、死亡等命题的洞察与思考。

二、对世界虚无的体验

鲁迅曾经对自己的思想做过这样的审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6]17}。可以说，鲁迅对于“黑暗与虚无”一直有一种体己的体验，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梦影。据鲁迅生前好友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他曾把自己的生活比喻为“周围是黑暗的洞穴，在黑暗的洞穴里继续地碰着鼻子走路”^{[14]8}，这种“黑暗的洞穴”

就如同一个荒诞的存在,无所不在又无法把控,显然已成为鲁迅视阈中这个世界的隐喻象征,即所谓的“无地”和“无物之阵”,也即是过客所言的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称呼”的世界。这种世界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家园,没有意义、不可理解、冷漠而且独立,它不会在意是否“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15]143},“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3]28},置身其中,人茫然无据,无家可归。

对世界虚无的体验同样弥漫在陀氏的世界中。在其文字中,任何关于现实世界的意义都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陀氏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有什么能比现实生活更荒诞,更令人感到意外呢?什么东西有时能比现实生活更不可信呢?小说家永远也想象不出现实生活每天以最平凡的形式成千上万地向我们提供的那些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11]223}。在《作家日记》中,他更是揭示出“人在世界上,同时扮演着原告和被告的双重身份,又同时扮演着被告与法官的双重身份”^{[16]467}这一尴尬的困境。在名为《豆粒》的作品中,他以“死人”的目光回顾人世间的的生活,指出“在人世生活要想不撒谎是办不到的,因为生活和撒谎是一双同义词”^{[17]198}。此外,在小说中,陀氏还塑造出了为数众多的荒诞似的“西西弗”形象,借他们之口发出了极其悲怆的声音:

“这大地上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就一无所有了。”^{[10]364}
(《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

“我们都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受尽我们的生活的煎熬!说真的,您瞧,事实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中间的一切是何等冷漠、阴森,仿佛在生气似的。”^{[9]301}(《白夜》中的“我”)

“假如我有不出生之权,那么我肯定不会同意在如此捉弄人的情况下生存。”^{[18]509}(《白痴》中的伊波立特)

……

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一书中,陀氏曾对“神秘的恐怖”有过一大段的心境抒发:

“这是对某种东西的一种令人不堪忍受、使人无比痛苦的恐惧,这种东西是我难以形容的、是根本不可理解、完全异乎常态的,然而也许在同一分钟它就会成为实在之物,仿佛嘲笑理智的一切判断似地向我走来,像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样站在我的面前,阴森可怖、没有定型、

铁面无情。这种恐惧往往不顾理性的任何阻挠而逐渐增强,终于使理性丧失了任何抗拒这种感觉的能力。”^{[19]69}

这种“神秘的恐怖”,无形、莫名、恐怖、反理性!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3]48}和“鬼打墙”^{[20]56}。二者眼中的世界都具有这样的异己性和敌对性,它外在于人的精神和意识之外,不仅不会理解人,而且对其真实的存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阿Q临刑前将这种恐怖化成一种实体性的东西:“那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象两颗鬼火,似乎远远地穿透了他的皮肉”^{[15]121},在陀氏《二重人格》的篇末,也出现了这样充满敌意的“眼睛”意象:

“左右两边都是黑压压的树林,荒凉、空阔。忽然,他呆住了:黑暗中有两只火一般的眼睛望着他,随即,这两只眼睛流露出阴险的喜色。”^{[21]301}

不难看出,这两段描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有意识地赋予了“眼睛”以异己性的象征意味。

三、孤独与绝望意识

由于对世界的这种虚无与荒诞性的体验,鲁迅与陀氏都深刻地意识到具有自由意识的个体无法摆脱的孤独宿命。在《影的告别》中,鲁迅对此做出了极为形象的描述:进退失据的“我”虽然不愿彷徨于“无地”,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但“终于彷徨于无地”,“彷徨于明暗之间”^{[3]6},这就是“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悲哀”^{[15]4}和“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的“寂寞”^{[15]4}。在《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中,他都对孤独进行了生动的文学性表达。

孤独感同样笼罩在陀氏生命的上空,这也是陀氏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比如在《温顺的女性》中,那位“沉默的丈夫”将自己的个体孤独引申为无所不在的人类最后的孤独,陀氏说:“人们孤零零的在世界上——苦就苦在这里!……据说,太阳使宇宙充满了无限生机。太阳将会升起,看它一眼吧,难道它不是一具僵尸?一切都是死的,到处都是死尸呀。人,孤独的人,他们的周围一片死寂——这就是尘世。”^{[9]644}在《少年》中,陀氏也讲过类似的话,当面对克洛德·洛兰的画时,“人们突然明白了,他们完全孤苦伶仃了,一瞬间理解了孤独的深刻内涵。”^{[22]591}陀氏笔下的主人公也几乎都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封闭阁楼里的行只影单者,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永远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认为《罪与罚》中的那个意象——“有一间小房子,像乡下

洗澡间一样，熏得发了黑，四角落里全是蜘蛛”含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寂寞”^{[23]310}。

在孤独这种生命的主旋律中，绝望感就无法避免了。这里的绝望指的是对死亡必然带给个体生命的偶然性、有限性的惶恐感和无处躲藏的危机意识，它意味着人处于荒诞的世界中彷徨无助，精神避难所和栖息之地变成了幻影，希望之光不过是萤火。陀氏在少年时代就表达过这种绝望的感受，他说：“活着而没有希望是悲哀的。向前看，未来使我感到可怕。我就像在没有一丝阳光的寒冰极地的氛围中奔跑。”^{[14]6}此后他多次在作品将自己的生活形容为“被活埋着，给封闭在棺材里”，他说：“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没有尽头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石块一样重重地压在我的灵魂上。”^{[11]67}而且“不可能再往前走，也无路可走；路已经没有，路已走尽”^{[11]7}。鲁迅所描绘的那种“看不见的地狱”——“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5]64}——同样呈现出这样一副令人绝望的世界图景，从鲁迅的那种连“绝望”本身也是“虚妄”^{[3]17}的切肤之痛中我们似乎也能听到陀氏所说的“我害怕自杀，因为我不敢表现灵魂的伟大。我知道那将是又一场骗局，一连串骗局之中的最后一场”^{[24]894}的极致悲哀。

对这种绝望的感受，两人的作品中也都有着生动的描述。在《涅朵琦卡》中，陀氏这样渲染一位小提琴手临死前弹奏的音乐：

“这不是小提琴的声音，而像是某人极其可怕的嗓门在我们幽暗的住所里第一次发出巨响……我坚信我听到了呻吟，是活人的哀叫、号哭；通过这些声音宣泄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绝望。临了，凡是恸哭中包含的全部哀伤似乎一下子聚合在一起，当凝聚着这一切的凄厉的结尾和弦终于拉响的时候……”^{[25]113}

在鲁迅的《孤独者》中，这种绝望的、悲哀的琴声化成了魏连受恸人心魂的嚎哭：“忽然，他流下泪来了，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26]91}

陀氏对这位郁郁寡欢的小提琴手的“死”的揭示中，也蕴含着魏连受的“死因”：

“他死了，因为这样的死是他整个一生必然和自然的结局。他应该这样死去，因为他的生命赖以支持的一切一下子崩溃了，像一个幻影，像子虚乌有的空想那样烟消云散了。他死了，

因为他最后的希望已告幻灭，他借以欺骗自己和支撑全部生活的一切，顷刻间在他本人面前豁然迸裂，清清楚楚地现出了本相。”^{[25]119}

像这样的孤独者和绝望者，是鲁迅与陀氏的文章中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因孤独而绝望，因绝望而愈发孤独，且这种孤独与绝望并不是发生于物质的层面，而是具有形而上色彩的气质特征，“无论我遇到什么，我是否归于毁灭，我都要孤独”^{[27]966}也就成为了这类人物的永恒宿命。

四、对死亡的追问

鲁迅与陀氏笔下的孤独者和绝望者的宿命指向是死亡，这是他们为其所设置的一种必然的归宿。加缪讲过：“在（意识到）荒谬之后，一切都被动摇了。‘我所是’的这个观念，我把一切都看作有某种意义的行动方式（即使我有时可能说实际上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被一种可能的死亡的荒谬感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揭露无遗。”^{[28]65}从这样一个角度，鲁迅展开对死亡的反思，他说：“我只很明确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2]277}。在鲁迅看来，死亡贯穿于人存在的始终，无时不在的与生命相伴，筑台做工同时又是“掘坑造坟”^{[2]276}，人的既往、现在和未来被联系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2]276}陀氏对此也有着相似的感悟，他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

“我想到欧洲去一趟，我就从这里动身；我也知道我这不过是走向坟墓，只不过这是极其珍贵的坟墓，如此而已！在那里躺着些珍贵的死人，每块碑石上都写着那过去的、灿烂的生命，那对于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科学所抱的狂热的信仰。我早就知道，我会匍匐在地，吻那些碑石，哭它们，但同时我的心里却深知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仅仅不过是坟墓而已。”^{[10]344}

在妻子玛莎患病死去的当晚，巨大的悲痛使陀氏在日记中坦露出心底深处隐藏着的对来世的怀疑和对死亡终极性的确信，他这样说：

“玛莎躺在桌子上。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爱人如己，遵守基督的圣训，是根本行不通的。自我的法则总是风行于尘世之中，自我挡在路中。”^{[29]316}

人在世界上不过是一个过客，面临的唯一的必然性竟然就是死亡，这既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又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真实。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只

有认识到自己的死,真正的存在才成为可能,死也是各种可能性中最涉及个人、最触及内心的一种,它必然要由我自己承担,没有人能替我死。因此在死亡面前,生命具有绝对的价值,死亡的意义正是对生命的价值的揭示。对于这层意义,鲁迅与陀氏都深切地体悟到了,因而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同样听到了对死亡的赞歌。鲁迅称“‘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代最动人的悲剧”^{[30]10};在这种“死亡”中有一种“生”的绚烂与辉煌,他说:“书不在人间,惟从两处可以觅得:一是‘旋儿’,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终’——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31]255}因此鲁迅认为,因为生命的“死亡”证明了生命的“曾经存活”和“还非空虚”^{[32]28},所以“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在这个意义上,人甚至可以从荒诞中创造出意义,即所谓的“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32]368}。鲁迅将这种生生死死、方死放生的境界凝炼为四句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33]37}那篇不朽的《过客》不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面对死亡时试验自我的强力意志,展现生命价值的伟大篇章吗?

陀氏同样有这样一种向死而生的伟大追问。1840年代临刑被赦后,他认为自己获得全新的生命形态,在经历了与死亡的擦肩而过后,对生活有了更强烈的渴望,在给其兄的信中他说:“我的心依旧,正如我的血肉依旧,它依然像以前那样能爱、能受苦、能怜悯、能记忆,而且不论发生什么,它都是生命。On voit le soleil(一个人看见了太阳)!”^{[23]150}在《白痴》中,陀氏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一个临刑前的死刑犯的内心感受,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写到死亡的召唤一步步将他推向了热爱生命的高峰,“如果不死,那有多好!如果生命可以失而复得,那有多好,那将是怎样一笔巨大的财富呀!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我会把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和损失。”^{[18]72}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所以生命才是宝贵的,因此陀氏认为生和死是不可分割的,死亡之中孕育着新生,“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果死不发生,那么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10]1}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带有非常浓厚的东正教色彩,带有极强的彼岸性特征,而鲁迅的死亡观里面有一种进化论的脉络,且尼采主义的强力意志色彩浓重,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五、结 语

当鲁迅与陀氏的心灵之路走到死亡的尽处时,他们对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探寻和逼问终于露出了曙光。在这里,他们并没有陷入无法自拔的绝望中,而是在死亡的绝壁前展开了对它的反抗,用不同的方式赋予生命以意义。鲁迅用“兴国忧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调和自我内在的个体矛盾。在民族利益的绝对前提下,鲁迅抑制住自己个体的“生命之树”,努力地设法与大众取得一致,甘愿做一个吹响民族黎明号角的天使,这种内在的动力或者说功利化的追求,无疑来源于作为中国文化酝酿出来的实然个体的历史困境,高旭东对此总结道:“一种执着于现世今生的整体意识必然会淡化鲁迅的孤独和悲凉,使他即使在绝望中也能够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斗,改造国民性。”^{[33]267}而陀氏则回归了上帝,从反面趋向了对上帝的认同,这就是假如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假如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就会失去意义和价值,人类就会陷入巨大的虚无之中,“一旦否定了基督,结果必将血流遍地”^{[10]475},因此上帝就是人类生命意义的最根本的保障,于是他努力地用上帝之爱的精神来战胜自身的黑暗与怀疑。就如默里所说的:“对于他来说,上帝是接受的可能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希望……他求索的不过是如何生活下去的途径而已。”^{[34]155}对于陀氏的这种选择,鲁迅谨慎地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1]163},其原因就在于中俄文化的差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1]163}可以看出,当鲁迅与陀氏不约而同地站在自由个体的立场上思考关涉个体生命的重大命题后,最终还是无法真正地超脱于自己背后的文化土壤,一个走向了天国高唱爱的颂歌,一个滞留在此岸为民众呐喊战斗。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162.
- [2] 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279.
- [3] 鲁迅.野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6-48.
- [4] 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18.
- [5] 鲁迅.集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5-86.
- [6] 鲁迅.两地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8.
- [7]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下[M].张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321.

- [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M].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9.
- [9]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中短篇小说选[M].文颖,曹中德,成时,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01-644.
-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书信选[M].冯增义,徐振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12]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M].冰夷,满涛,孟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78.
-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353.
- [14]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M].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8.
- [15]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43.
- [16]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上[M].张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467.
- [17]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98.
- [18]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72-509.
- [19]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M].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9.
- [20] 鲁迅.华盖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6.
- [21]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中短篇小说:一[M].周朴之,种觉,叶灵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01.
- [22] 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M].文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91.
- [23] 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M].白春仁,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10.
- [24]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M].南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894.
- [25]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中短篇小说选:二[M].荣如德,芮鹤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13-119.
- [26] 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1.
- [27]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韦丛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966.
- [28]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65.
- [29] 莉莎·克纳普.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M].季广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6.
- [30]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0.
- [31]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55.
- [32] 鲁迅.热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68.
- [33] 高旭东.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267.
- [34] 海塞,扎东斯基,纪德,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M].斯人,张耳,张东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5.

(责任编辑:陈丽琼)